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市丝绸进出口公司
编写
徐新吾主编

JINDAI
JIANGNANSIZHI
GONGYESHU

近代 江南丝织 工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近代 江南丝织 工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市丝绸进出口公司
编写

徐新吾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052806

责任编辑 罗 湘
封面装帧 任 澍
美术编辑 王建纲

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上海市丝绸进出口公司 编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4 字数 327,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

(内精装 1,300本)

ISBN 7-208-00956-2/K·202

定价(精) 15.00元 (平) 10.00元

编者说明

本书由从事丝织业工作多年的宋保林、钱序葆、邱鸿书、娄尔品、丁庆龄、胡敬德以及张守愚等同志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领导下成立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编写组进行编写，由该所徐新吾研究员主编。

本书定稿后，经上海市丝绸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梁东尧同志审阅，并为本书作序。本书的出版，是与梁东尧同志的热情支持分不开的。

本书共分七章，其中一、二两章中的“清代织造局”部分邀请本所所长助理沈祖炜撰写；第七章中的“美亚丝织厂厂史”由原该厂上海分公司经理邱鸿书编写；第七章中的“同章绸庄及云林丝织厂简史”以及第六章中的“绸缎染炼、印花、涂浆与丝织业的关系”均由娄尔品撰写；第六章中的“绸缎商业与丝织业的关系”由胡敬德撰写；丁庆龄同志提供与编写部分素材后，因年迈退出编写。其余部分均由张守愚在主编领导下写成。张健曾协助搜集资料、初步整理及誊抄等工作。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除参阅已发表的有关著作均已在书内注明外，承民建、工商联杭州两会郑志新、姚铭鼎同志；苏州两会高吉甫、丁庆田同志；无锡两会高景岳、张恩深同志以及镇江两会、丹阳两会、双林绫绢厂、南京中兴源丝织厂等，还有上海同业徐伯衡、傅福田、金传彬、高楚英、曹勉之、娄尔端、吴荣成、陶友川等或借阅有关书籍、或提供与代抄有关史料等等。此外，上海

市丝绸进出口公司宣教科副科长魏国龙同志为支持本书的出版亦作了很多工作,均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者

1989年12月

序

上海市丝绸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梁东尧

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养蚕、缫丝、织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丝绸的发明，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并使我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艺术宝库更加璀璨。这是每个从事丝绸工作同仁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江南和上海是我国丝绸工业的主要地区，它的丝绸工业史是中国丝绸工业史的缩影。几位丝织业的老前辈，花了数年的精力，翻阅了大量的典籍，巨书昼写，孜孜矻矻，编纂了这本《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此乃丝绸界的一大盛事。

在解放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丝绸工业和孕育它的中国大地一样，饱尝了人祸、天灾、战乱的痛苦。《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用浓重的笔墨和丰实的历史资料，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江南丝织工业的兴衰图。它告诉我们，封建社会的中华古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不能使丝绸事业振兴和腾飞的。饱经沧桑的江南丝绸业到了解放前夕，已是破壁毁珪，满目疮痍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蓬勃发展的丝绸事业。解放以后，中国，特别是江南和上海的丝绸事业得以新生，各种丝织品生产稳定增长，丝绸出口额大幅度上升。1983年，全国丝绸产量近10亿米，较历史最高产的1936年，增

加了四倍。1988年，我国丝绸生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解放40年来，上海市丝绸进出口公司累计出口创汇近70余亿美元。经过10年改革的上海丝绸事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风姿，活跃于国内和国际舞台。

《论语·为政》曰：温故而知新。我相信，《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能使人们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得到有益的启迪。

编者要我作序。恭敬不如从命，我谨以上面的几句话，权作序。

目 录

编者说明	1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丝织工业	15
第一节 先秦至宋元简况	15
第二节 明代的丝织业	24
第三节 清代前期江南民间丝织业与资本主义萌芽	39
第四节 清代官营织造局	60
第二章 太平天国起义至辛亥革命前的江南丝织业	
(1850—1911)	76
第一节 清代官营织造局的没落	76
第二节 战乱期间江南丝织业所受损害及战后初期 恢复情况(1853—1880)	78
第三节 80年代至辛亥革命前夕的江南丝织业 (1881—1911)	92
第四节 新兴起的丝织业产地	107

第三章	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的江南丝织业	
	(1912—1937)·····	116
第一节	近代丝织工具手拉机与电力机的出现·····	117
第二节	近代丝织业发展中的特点与起伏变化·····	121
第三节	江苏地区丝织业的发展和变化·····	125
第四节	浙江地区丝织业的发展和变化·····	143
第五节	上海地区丝织业的发展和变化·····	162
第六节	人造丝进口及丝织品的进出口对丝织工业 的影响·····	176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江南丝织业(1937—1945)·····	200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江南丝织业遭受破坏与全面 萎缩·····	200
第二节	上海形成“孤岛”后丝织业的畸形发展·····	211
第三节	这一时期丝绸的对外贸易·····	229
第五章	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夕的江南丝织业	
	(1945—1949)·····	237
第一节	投机囤积影响下的江南丝织业·····	237
第二节	人造丝配给和自购人造丝外汇分配经过·····	242
第三节	丝织品出口及上海筹组丝织产销联营公司·····	243
第四节	解放前夕的江南丝织工业·····	247
第六章	丝织工业与绸缎染炼、印花工业以及绸缎	
	商业的关系·····	256
第一节	绸缎染炼、印花等工业与丝织工业的关系·····	256
第二节	丝织工业与绸缎商业的关系·····	277

第七章	民族资本经营的几家典型丝织企业·····	295
I.	美亚织绸厂厂史·····	295
II.	同章绸庄及云林丝织厂简史·····	420
III.	杭州都锦生丝织风景厂简史·····	425
附录:	丝绸对外贸易统计资料·····	429
一、	1859—1941年全国蚕丝(真丝)绸缎出口数量 统计表·····	430
二、	1902—1941年全国真丝绸缎出口国外各地区 数量表·····	432
三、	(1)1902—1930年全国蚕丝绸缎出口国别 地区(按数量)百分比表·····	434
	(2)1931—1941年全国蚕丝绸缎出口国别 地区(按数量)百分比表·····	435
四、	1859—1931年全国蚕丝绸缎出口量值统 计表·····	436
五、	1919年,1927—1931年江南各口岸出口(各类) 丝织品价值统计表·····	437
六、	1925—1941年全国人造丝织品及人造丝交 织品出口统计表·····	440
七、	1882—1941年全国丝织品出口统计表·····	441
八、	1902—1940年全国进口丝织品统计表·····	442
九、	1909—1940年全国各口岸进口人造丝 统计表·····	445

前 言

(一)

中国是世界蚕丝业最早发源地，可追溯到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当时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均已出现原始的蚕丝事业。^①奴隶社会末期的西周，已有了丝绸业商品经济的记载。战国时丝绸生产与贸易发达，齐纨、鲁缟以及楚国和江南吴越的罗、绢等名满列国。西汉武帝时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对沟通与西域以及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隋唐时期，中国蚕丝与丝绸的生产技术亦向中近东、西欧与日本、朝鲜等地传播。此后，历任宋、元、明、清诸代，蚕丝事业在全国各地续有发展，而以江南为最盛。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始终是世界蚕丝与丝绸最主要的生产与供应国家。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体制与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下，纺织手工业的丝、麻、毛及后起的棉业，除少数大地主使用奴仆进行生产外，一般都结合在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家庭副业中，不仅是“耕织结合”，而且在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中，从对农产品原料的初加工到成为半制品的丝缕以至最后的成品布帛等，都是“一竿子”到底，在小农家内完成，其中

^① 《文物》1976年第8期，1980年第5期；《考古》1963年第5期。

特别重要的是纺与织的“纺织结合”。在连续生产工序中唯一发生分裂的是丝手工业中的缫丝与织绸。这是因为在织绸业的前道工序(或称环节)的生丝生产早已大量商品化了。生丝由于有着“量轻值高”的特点,曾做为交换手段与征调纳税对象,并为了对外贸易的需要,发展了商品生产,这就使织绸业可以部分地脱离农家内部连续自给性生产的锁链,而分化出独立的城镇“机户”,它们可以从市场上取得生丝原料。然而保留在农家内部的织绸业仍占很大比重。对于丝手工业中的缫丝业来说,则由于其前道工序的“茧”的商品化发展迟缓,就仍然只能长期关闭在小农家内。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丝的做为纳税对象与已经发展了商品化,官府掌握了大量生丝,于是兴起了历代官府织造手工工场,专以织造高档绸匹为统治阶级服务。^①

中国丝绸织造工具在汉代已从踞织机发展到斜织机,这有汉代画像石为证。以后经过不断改进,织绸机与提花设备都发展到相当水平。迨宋末元初《梓人遗制》问世,总结与统一了织绸机的大体规范。自此之后,除了在工艺过程方面继续有所改进提高外,织绸基本工具的织机就已基本定型,鲜有进步了。这是由于,中国织绸业原来只是农家副业,以后虽然出现了机户,也只是长期的个体小生产,在改进织机设备上有一定限度的局限性。在官营织造方面,虽是集中的手工工场,却是非商品性生产,它并无市场竞争与盈利的要求,既不计成本,也缺少改革织机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客观需要。但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靡丽的直接消费,在工艺过程中是精益求精的。官营织造曾与民间巧匠如唐代的明资匠、巧儿匠等在技艺上相互交流改进,织造出各种高贵品种。它们技艺高超,堪称艺术佳品,而费时费

^① 本段请参阅徐新吾文,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1983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力不资，并无商品市场的发展前途；加以技艺的保密，有的后来失传了。不过，工艺改进亦有历史的进步过程，这表现为由手工丝绣改为用织机提花等，而提花机也有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反复进化改革的过程。

在中国纺织手工业的古代历史中，唯一从农家分化出来的是丝织业独立作坊的机户。按史料记载，宋代已有机户，而为数甚少。^①从小农经济副业的小商品生产到独立机户的出现，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一个历史首要前提。但是机户出现后，还要有一个摆脱封建主义桎梏的过程。在封建主义的种种压制剥削包括牙行制的阻隔与匠籍制的控制束缚下，机户不仅没有发展手工工场的前途，商人也无由楔入去支配生产。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终于是不能遏制的，当明代后期江南丝织品商品市场扩大，城镇机户尤其是大城市如江南的苏、宁、杭的机户有了长足的发展，新的机户大多已非原在籍匠户，匠籍制实际上已经崩溃，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官营织造的没落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封建官府凭借其政权统治力量，除对丝绸商品流通在关卡税收上肆意盘剥外，仍旧以“匠籍”为借口，对机户横加剥削，特别是明代宦官对织造事业的当政把持，恣意苛扰，成为当时苏杭等地不断爆发机户、机匠大规模斗争的经济根源。^②而这时，丝织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无法破土而出。过去所说在明末江南已出现的织绸业手工工场已经作者考证否定。^③

到了清初，历史条件有了重大变化。康熙年间，封建政权对

① 《宋会要》第166册，“刑法”上，宣和六年四月条。

②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周起元疏》。

③ 见徐新吾：《关于鸦片战争前中国民营丝织手工工场并未存在的考证》，《学术月刊》1983年第9期。

丝织业的高压有了减缓，匠籍制在康雍年间摊丁入地后彻底废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提高，绸牙行亦已没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得以出现萌芽。但也只是采取商人支配生产的包买主即所谓“帐房”的形态，手工工场形态仍未能产生。据有确实史料可以证明的，它首先出现在康熙年间的江宁(南京)地区，^①其次是雍乾年间的苏州，^②而杭州出现较晚并较稀少，该地虽亦有放丝收绸的包买主经营，但始终并无“帐房”这一称谓。考其原因，宁、苏、杭虽都是官营织造重地，机户向商人资本转化，并由最初依附官营织造而发展壮大起来，坐商本身顶替客商开辟市场商品的远销，绸牙行亦因之渐被排挤淘汰。但商人资本的支配生产，特别是要牢固的支配生产，则既要有取得生丝原料的便利，又要阻止、切断小生产者的自行取得原料，这就是说，不仅要在销售市场的扩大上迫使小生产者从属于他们，而且要在原料取得的一头也从属于他们，这样才能有效地隔绝小生产者同客商的直接交易。南京地区比较远离原料产地，近郊虽有产丝而量少质粗，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从湖嘉地区大量购进，小机户便难以胜任，这是南京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有利条件；而杭州迹近四郊产丝区，当地商人资本便比较难以控制住小机户。至于蚕丝区的中小丝织业市镇则更是这样。不仅如此，当大城市的苏、宁发展了织“熟货”(先染丝后织造)以后，织造品种比较高级，织造进度放慢而生丝原料占成本的比重更加大，小机户不胜资金周转缓滞的负担，绝大多数就必须更依赖商人资本放丝收绸以取得工缴的这种经营方式了。在南京、苏州，一家大帐房控制众多小机

①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5，“拾补”。

② 据雍正十二年“长州县永禁机匠叫歇碑”刻载，机匠工资与酒资已有全业性争议与“叫歇”(罢工)，当是商人包买主制发展后形成的。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户的织机可达四五百台，小机户几乎全部沦为一些帐房的附庸，只剩余极少数小机户可以保持着自产自销的经营。查织造丝织品的“熟货”，也是工艺过程的一大进步，虽早已有之，而明清之际在大城市有了鼎盛发展，在苏宁两大城市织造锦、缎、纱之属，已完全排挤了罗、绢之类的“生货”，只是基本上由中小市镇的机户与农户去专门织造了。熟货的织造兴起了染丝业与并丝业（先拈丝后染），并丝业亦称车户、料房、摇经作等。这形成了在大城市织造高一级的熟货与中小市镇织造低一级的生货绸匹的社会分工，并且在大城市内兴起染丝业的各类染坊、染匠，也出现了缎工、纱工、车匠等不同工匠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结综掏泛等手工艺专业。当商人资本包买主制兴起之后，商人支配与组织生产，巩固与扩大了这种社会分工，在捶丝、络丝、牵经、上花、织造等工序上日益分化为专业生产。^①这当然有其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商人支配生产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道路，它使小生产者长期处于分散落后的状态与陷入贫困的地位，妨碍生产工具的改革与革新，阻滞着手工工场的出现，以至从清初迄至清末的200余年间，私营丝织手工工场的生产形态始终不得出现。

清代前期的官营织造改变了明代分散多处的格局，重建为京师与宁、苏、杭四个织造局的集中经营方式，对于工匠的隶属关系也朝着雇佣劳动转化。在康熙乾隆时期，它一时曾鼎盛发展。然而官营织造终究是封建衙门式的经营，随着清皇朝国力的衰退，财政支绌，尤其是它本身劳动生产率低，靡费极大，终于无法支撑。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重蹈明代官办织造的覆辙，逐渐衰落下去了。

^①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有关资料。

(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古老的丝织业虽早在清初康熙年间便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一直维持着包买主的落后形态，长期未能出现手工工场，更不可能有工厂化的前途。但在这时，国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丝织业在18世纪到19世纪间已由手工工场向工厂化过渡，19世纪中叶左右出现了织绸动力机。^①当时法国里昂已成为世界丝织业中心，机织高级绸匹行销欧美。中国除扩大生丝出口为西欧丝织工厂提供原料，在不久以后促使了中国缫丝业的工厂化外，对织绸业来说，机户仍然使用着古老的投梭木机，主要供应国内市场。而这种内销市场，随着清皇朝自乾嘉以后的国力减退，便已出现衰落的迹象了。对国外市场则除传统的东南亚包括印度和南洋一带有一部分销场外，对欧美市场早无插足余地，相反地甚至已受到进口呢绒与绸缎的竞争威胁。在这种内外销不振的背景下，中国丝绸业总的衰退趋势已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种趋势在全国丝织业重心的江南表现得十分明显。当19世纪中叶，以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为转折点，接着江南各地历遭兵燹，丝织业急剧败落。据粗略估计，当时江南的南京、苏州、镇江、盛泽、杭州、湖州、双林、绍兴、宁波等9个城镇丝织业中心地区，于道光年间(1821—1850)共有织机68900台，经过太平天国时期(1851—1864)，以迄1880年的调查，仅有织机32048台，减少了一半以上。这时，已是经过了战争后近20年

^①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第十二章。三联书店1963年版。

的恢复期，足见其衰落有其内在原因，只是由于战争破坏而加剧了。此后，自 1880 年至 1911 年，上述 9 个地区织机总数续有恢复，却仍不过 48160 台，较道光年间还少两万余台，更不可能重现乾嘉时期的盛况了。此外，据 1911 年的调查，还有新兴地区江苏丹阳的织机 2000 台和上海地区初次出现的 105 台，数量还很有限。

关于对丝织业绸匹总产量的兴衰估计，不仅各地区资料残缺不齐，而且由于绸匹有重量与轻量之分，相差何止倍蓰，无从以绸匹产量尤其是在不同地区之间统一比较，故只能以织机及后来(1911 年后)区别不同织机的类型观察其数量消长变化。但是，对织机的估计数字，虽散见各有关地区出版物或有关方面提供的素材，亦有海关等调查材料，来源颇多不同，时间与包括地区口径亦每有参差，有的地区在同一阶段反映的织机台数颇相径庭，估计的成份很大，尤其对农村中的投梭木机多付阙如，不可能对实际情况加以确切反映。只能说描述了丝织业兴衰情况的大致轮廓。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在这总的衰落趋势中，若分地区看，则是不平衡的，这是由于各地区在经营方式、织造品种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有所不同的缘故。其中衰败最突出的是南京地区，该地区在清前期的康熙乾年间曾是江南丝织业最兴旺和包买主形态最发达的地方，织造品种则以熟货的“缎”为主，织机曾达到 30000 台以上，到 1880 年缎机及少数其他织机仅余 5800 台，即使到 1911 年亦不过 6100 台，可谓一蹶不振。苏州地区也是包买主经营熟货占绝对优势，织造品种则主要有“缎”与“纱”两项，于道光年间尚有机 9000 台，1880 年降为 5500 台，1911 年恢复为 7000 台，情况略胜于南京。杭州地区则包买主制不发达，织造品种以熟货与生货并重，这一历史阶段起伏甚大，道光年间织机约有 10000 台，